

我与毛国伦先生相识于20多年前一次赴日的参访。国伦先生寡言慎行,但遇某些话题之时,则大不相同。比如谈儒学道家时聚精会神、频发论议;见精品杰作时眉飞色舞、大动手足。去东京博物馆,我们几人走马一过,早早出来观花。国伦先生最迟出来,他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手舞足蹈地说里面有不得了的好东西,你们错过了看,以后可不要懊悔啊。一行人中,唯我年纪最轻,听罢欣然随他返回,原来是两幅米芾的真迹,细细地看了,也觉得怎么样——在那时的我眼里,它们只是展品;在他看来,则是活生生的艺术。二十六年过去,我已到了他当时的年纪,这段回忆依然鲜明,借此的思考也逐渐深沉。我感到国伦先生至少是从中年始,对哲学、艺术及其关系的看法就体现在他的画中,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定,到线条的走向、笔墨的运用,再到主次的配合、虚实的变化……

我对自身的认知,居然也借此变得清晰起来。对他的画,我缘何既有感性上的爱好,又有理性上的信服?要知道同时具备了这两者的话,其中必有奥妙存焉。最明显的,是我们都对传统文化既感亲

吩咐毫尖追不朽

胡晓军

事业和学问,在儒的务实奋发、道的超脱潇洒、释的慈悲怀抱中选择重点,并与“相由心生”匹配起来。国伦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对儒道释的认知、对文史哲的理解导入了对古代人物的绘事。他笔下的儒家人物最多,有孔子、苏武、杜甫还有陆游,构图稳重、线条厚重、风格持重以呈现崇仁尚义和刚健有为。至于环境,常配以松竹梅和牛马羊。松竹梅的隐喻不消多说,牛马羊也是一样。我甚至认为食草动物可代表儒家,食肉动物可象征法家,而杂食性动物则可以暗示道家,比如鹤、猴与龟,当然,老子的坐骑是例外。

他笔下的道家人物也多,有老子、陶潜、李白还有魏晋诸贤,构图简洁、线条轻灵、风格飘逸以呈现冲虚恬淡和潇洒疏狂。释家人物如达摩,相对较少,他画得更加简约和质朴。更多的情形是,国伦先生将道释合体的中国式佛学——禅,注入了他想注入的人物形象中。顺便一提,将道心和禅意注入儒家,能缓释其极端、激进的弊端,如急功近利、揽权专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等。他的诸葛亮,有一丝道家风范,他的岳武穆,有三分书生气质,似乎寄托了他对古人的评价,其中有崇拜、有惋惜,更隐约有儒道相参的心意。若是如此,那么他对儒道释和文史哲的认知,既遵循了古人本身的思想,又寄托了自己的愿望,于是表面是笔墨、是形象,内在是思辨、是感情,是自我之“心”与古人之“相”的映射。美国学者威尔逊说:“任何一部小说的真实元素都是作者个性的一部分。作者就



长乐未央
琴瑟友之
(篆刻) 刘一闻

每年上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我都比较期待,可以通过大银幕穿越时空饱览大师佳作,无疑是影迷的“最高殊荣”。今年的上影节总共致敬了三位大师,其中,恰逢增村保造诞辰100周年,电影节更是其首部代表作品,其中两部更是世界首映的4K修复版本,机会难得,在系统开票的头两分钟我便迅速将《最高殊勋夫人》收入囊中。细算下来,增村保造的导演处女作《接吻》距离今天已经过去67年,《最高殊勋夫人》也是六十几年的作品,当我走入影院观看这部“老电影”时,开场摩登配色的城市空镜配合着明快的音乐便迅速将我拉入那个故事,之后的九十分钟,影厅内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笑声,也展现了影片具有参考意义的现代性,其中的观念冲突和人情世故放在现在依旧不过时。

比起后来《刺青》等大胆描写情欲的作品,包括《接吻》《青空娘》《最高殊勋夫人》等增村保造初期的这几部“都市小品”,无疑不是主人公大声说“爱”,干净纯粹地展现人物真实情感。这或许也是曾在意大利留学的增村保造,受到“真实表达”的影响,从某种层面上挑战传统电影语言和表达方式,大胆打破日本表里不一的爱情观,反抗当时日本电影擅长表达压抑的

正视内心,看向蓝天

卢偲嘉

文化和复杂的人伦关系。再来说说《最高殊勋夫人》这个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50年代末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京,受战后的西式生活影响,腾飞的经济让人们充满活力。影片同样以轻快欢闹的方式上演了一出平民三姐妹与富家三兄弟的世俗轻喜剧。这是增村保造在《青空娘》大获成功后,联手若尾文子再次将直木奖获奖作家源氏鸡太的小说搬上银幕。

尽管影片受时代性的局限,从片名“最高殊勋夫人”就可以看出一二,影片赋予婚姻至高无上的价值,前有大胆追爱的妙龄女白领,后有从《青空娘》就开始出现的男性对于女性的“公平竞争”,都是“全员婚”的一种时代印记。但影片中出现另外几位女性在这种传统观念之下仍展现出自己的个性,无疑也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抬起头,正视自己的想法与欲望。

大姐反客为主成为婚姻的“操控者”;若尾文子饰演的三女儿杏子和三郎共同抵抗家族联姻,反向追求真爱;最有意思的是三郎原本的女友富士子,富家女富士子一出场便身着工装,满身

众所周知,沈从文不但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巨匠,也是研究历史文物的学者,他在古代服饰考据上留下重彩浓墨的一笔,同时创作出与自身文学相比肩的辉煌成就。

1949年后,沈从文在时代变革中主动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自觉告别文坛来到历史博物馆,他在馆内被目为“反动作家”,不仅不被重视,还屡遭排斥,长时间连个办公写字的地方都没有,他的主要工作是陈列室展品书写标签,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当展厅观众人多了,他便主动上前讲解,可大家不敢恭听他的湘西土话,但他依然故我。

他在纷繁复杂的逆境中游心于物,安静地磨砺自己,自言“人生是一种沉默的斗争或一个沉默的战场”。十年后沈从文又倾注于服饰史的考究,因其不务正业,始终不获支持。直到周总理对文化部提出中国服装历史悠久,却没自己的服饰文化图书作为出访的国礼,时任副部长的齐燕铭顺势推介了沈从文的编撰计划,就这样,他没有敷衍,在特殊的环境里专注一事,坚持不懈,终不辱使命。“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了约十七年”,以“坚忍而图成”的开山之功,完成中国服饰史上第一部通史《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繁花落尽,字里行间销蚀了他人生中的最佳年华。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是一般通俗读物,沈从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掣领出古代服饰的大纲,从历代绘画、古籍版画、石刻雕塑、墓室壁画等资料中梳理甄别,利用考古出土的陶俑、纺织品、佩饰和器物等实证,抉微钩沉,对三千年以来中华服饰的礼仪制度、形式特征以及朝代更迭中的嬗变精准探索,会同历史

代价,要“形似”但当其影响到“神似”时,则及时止步。因为“写实”“形似”之必要,是为其与“写意”“神似”搭一座桥,同时为俗和雅之间搭一座桥。这座桥并不是现代的、标准型的直通大桥,而是古典的、个性化的曲折小桥。

我还感到,艺术的来源一是技艺、二是思想,艺术是两者的合体。技艺来自外部、来自接受教育和长期习练;思想源于内部、源于体验和自我觉醒。国伦先生在青年时代完成了前者,在中年时代实现了后者,并在此后几十年中,将两者合为了一体。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对古代人物的描绘,让我这个平时只是与文字打交道的人,能通过画面、笔墨、线条得到理性的印证和感性的共鸣,从而能以一颗心摆脱孤独、寂寞和抑郁,去热爱历史、时代和人们,相由心生、心生而相地活下去、活下去。

线描墨染称高手,轻若云飞重压斗。唤来人物共春秋,呼出善真和美丑。今思古意情皆有,形动神凝于尾首。接通哲理作心由,吩咐毫尖追不朽。(调寄 木兰花)

在他的人物形象、处境中显示出他自己的基本面貌。”此话套用到国伦先生的古代人物画,也无不妥,其中“个性”大致指的是“心”,而“基本面貌”便是“相由心生”的道理。

由此可见,我感到若从哲学观看国伦先生对写实和写意、貌合与貌离的态度及选择,就明瞭了。他倚重两者,也警惕两者,要写“实”但不以失“意”为

文献进行缜密对比,开创以“史实相证”的研究方法,成为中国服饰研究的奠基人。篋藏一封沈从文致家齐的函札,从中略见一斑,照录如下:

家齐兄:鞞鞞带制,《会要》虽提到上面缀系的东东西西,形象反映却似乎有些不尽一致。或参考一下韦洞墓石刻一拈花人,《故宫名画三百种》周昉“职贡图”和敦煌画西夏

挂一些日常物件,供游牧使用,又称蹠鞞带。《新唐书·五行志》:“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粉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又:“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向达先生指出:“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羈縻诸王之策,重以蕃降大盛,异族人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由此可见,盛唐之际的丝绸之路带来了中外贸易的繁荣,西域商贾纷纷沓来,长安城内胡风盛行,达官贵戚纷纷效仿,胡服俨然成为流行的“时装”,亦接连掀起了一波女性时尚的潮流。《新唐书·卷十四·车服志》记:“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襦衫,而士女衣胡服。”故刘禹锡有诗:“胡服何葳蕤,仙仙登舞榭。”传说魏国夫人也好穿胡服男装,如宋徽宗所摹唐人张萱的《魏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随行九位侍女中,竟有五人穿了男装。诚如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唐朝鼎盛时期开放包容的社会风尚和追求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文据函可知,想必是家齐同志向沈先生求教有关唐代胡服的小问题,原信不存,笔者仅知家齐为文物出版社编辑王家琦,毕业于东北大学,是历史学家金毓黻弟子。似乎沈从文对来函垂询极为重视,引经据典深究详答,是沈从文服饰研究中极具文献价值的史料,欣喜之余,就复函所列阐释如下:

《会要》指《唐会要》,卷三十一条曰:“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制,令内外官,依上元元年敕,文武官咸带七事。(谓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哆厥针筒、火石袋、鞞鞞等)”。唐武德四年,唐高祖颁布衣服诏,唐人服饰一改汉魏宽衣博带的风格,吸收胡服样式,男子常服为幞头、圆领袍衫、革带和长靴,其中革带正是西域胡人的装束,革带有孔,悬绳垂

大唐霓裳中的“时装”

王金声

《中国古代石刻画像选集》,由美术教育家王子云编辑,1957年出版。王子云早年留法,专攻雕塑与油画,曾任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有《唐代雕刻选》《中国雕塑艺术史》等著。

至于信中“韦洞墓、敦煌壁画、乾陵石刻、《故宫名画三百种》、《西域画集》”诸条,这些书在王家琦供职的文物出版社资料室里及《文物》所刊“唐韦洞墓发掘简报”中,应触手可得,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就在这页小字的彩笺,足以彰显沈从文倡导文史研究旨在“由物证史”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他寄望于后世潜心考证的拳拳之心。



早晨,我通常是被一声声悦耳的鸟鸣吵醒的。推开窗子,晨雾里的桃浦河在鸟鸣中渐渐地清晰起来,婀娜的翠柳、碧绿的河水,还有河岸红色步道上三三两两晨练的人们,以及在河面上飞翔着的不知名的各色小鸟,一齐都呈现在窗框里。自从搬到宝山大场镇桃浦河段的这个小区,许许多多早晨就是这样开始的。

临河而居,闲暇时,我常常倚靠在河边的某棵柳树干上,或是坐在步道的长椅上,贪婪地欣赏这眼前河岸的风景。看得出城镇绿化管理者维护的精心,各类灌木被修剪得有棱有角,漫长的岸线上花红柳绿。这样的水岸,自然成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临水处,常常聚着一众垂钓的居民,他们兴奋地抛出钓钩,便一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河面,等待着鱼儿咬钩的时刻。

远处还有一群以河为生的捕鱼者,那是夜鹭。你瞧,它们立于浅水处,雕塑般一动不动,那状态好像在小憩。突然,其中的一只夜鹭猛地扎进河水里,几秒钟后浮出水面,嘴里叼着一条挣扎着的小鱼,旋即,那夜鹭展开翅膀几乎擦着水面飞去了。或许,在河岸某处,一窝刚刚破壳的雏鹭正等着它哺育呢。

桃浦河的风光多姿多彩,风雨中它别有一番景致。从窗子望出去,岸上垂丝海棠粉色的花瓣、柳条上金色的柳絮,被吹落河面,很快形成彩色的波涛在河面涌动。风雨微弱的时候,我喜欢撑一把雨伞,去欣赏那雨中的桃浦河。这时候,碧绿的河水任由雨点在它平静的水面打出一个个水窝,岸边那垂柳把细长细长的枝条插入河水里,轻轻地随微风摆动,好一幅轻歌曼舞的画面啊。资料告诉我,这河流“根系”漫长乃至通江达海,它连接着市内的其他水浜,连接着黄浦江,直到远方的大海,因此,它与海水一样,有“潮起潮落”的时候,那时分,仿佛能够听得到它呼吸与心跳的声音。

这河面上偶尔也有驳船驶过,传来“突突突”的声响,我好奇地望着这驳船,船头上迎风站着的一位汉子,船尾飘扬着一面火红的国旗,给这碧绿的河面增添了一道艳丽的色彩。那汉子举着手机不停地拍照,他太专注于沿河的风光,我几次想与他打个招呼,甚至想问问他这船去哪?一天,又一条驳船“突突突”驶来,我心血来潮,在河岸跟着它并行,我突发奇想,想走通这桃浦河,但几公里后,被一道茂密的灌木丛挡住了去路,眼巴巴地望着驳船“突突突”一点点消失了。

临河而居,这河是妩媚而灵动的,对我有谜一样的魅力,盼望着有一天也站在那条“突突突”的驳船上,去尽览河岸风光……

临河而居

牛传忠



比电影更精彩的是我的生活。
光影故事 责编:沈琦华